万丹省宗教意识形态与政治实用主义在大选中之竞争

■ 雅加达：崔一生

在2019年大选，万丹省民族主义政党获得的国会选票比宗教政党更多。斗争民主党在万丹省的三个选区：丹格朗市，丹格朗县和南丹格朗市，以及大印尼运动党在四个选区：勒巴(Lebak)、西冷(Serang)县、西冷市和芝勒贡(Cilegon)市取得优势。以伊斯兰群众为基础的政党，即福利公正党只在一个地区，即班底兰/班德格朗(Pandeglang)获得优势。这个状况与2014年大选相差不远，斗争民主党和大印尼运动党也获得多数选票。

这个状况似乎回复到1955年大选时期万丹的政治色彩。当时，万丹是伊斯兰政党即玛苏米(Masyumi)控制的区域。印尼问题专家Herberth Feith在《印尼在1955年大选》一书记录，玛苏米在万丹获票达到224,000张，比获票104,000张的印尼国民党(PNI)多一倍，比获票84,000张的伊联党(NU)高二倍。在当时前万丹州(Keresidenan)，玛苏米党比印尼国民党更优势，获票高于西爪哇其他几州，甚至是最高的。当时印尼共产党是全国第四大党，获票相当少，只有9000张。令人疑惑问的是，为什么在1955年是伊斯兰政党控制的万丹，有强烈伊斯兰文化色彩的区域，在改革时代大选却被民族主义政党打败？

在1999年大选，斗争民主党在万丹区域的所有六个县市取得大多数选票。当时，万丹还是属于西爪哇的一部份，受到改革运动反对新秩序政权浪潮的影响。大选结果，斗争民主党获票飙升，虽然不太多，即约在23.9%(芝勒贡市)到40.3%(勒巴)之间。

这个比例已经相当超越于从业集团，从业集团在新秩序时代常常获票70%以上。除了斗争民主党，对从业集团的冲击也表现在：建设团结党在班底兰和西冷，以及国民使命党在丹格朗市和芝勒贡，获票相当多。

但是，从业集团选票滑落不太久。在2004年大选，已改名的从业阶层党能够扳回选票，在万丹六个县市获胜，虽然这个榕树党只能够取得微小的优势。从业阶层党的获票在17.1%和36.3%之间，被获票相当多的斗争民主党在勒巴和福利公正党在丹格朗市紧紧尾随。在2009年大选，受尤多约诺总统在大选当选的影响，从业阶层党开始受到民主党的赶超，民主党在丹格朗县市能够比从业阶层党获票更多，虽然差距不大。民主党在勒巴比获票27.9%，丹格朗25.2%和丹格朗市30.9%。

吸引人的是，在2009年大选，福利公正党在万丹的五个区域获得大多数选票。在丹格朗，西冷和芝勒贡平均获票有十几个百分比。甚至在丹格朗(县和市)获票能够超过从业阶层党，虽然不多。这意味着，民主党在2009年大选获胜对福利公正党有正面的影响，而对斗争民主党产生负面影响。

不能否认，万丹在各个时期，几次立法机构的选举是不断变化的区域。这个区域从1955年大选玛苏米党的“绿色”，在新秩序时代变成从业集团的“黄色”，以及在改革时代变成斗争民主党的“红色”，和大印尼运动党的色彩。

国家调研与创新机构(BRIN)资深研究员Lili Romli说，万丹是非常动态的。雅加达出现什麽问题，肯定会影响万丹。当雅加达出现改革运动时，社会的政治选择会与对政党选择相关联。同样的在2017年雅加达出现原生主义(Primodial)的阿学事件时，也影响万丹的选民。2019年大印尼运动党在四个区域的胜选，被视为是2017年雅加达事件的沉淀。公众寻找代替佐科维的人物，这个人是伯拉波沃。

选择大印尼运动党是伯拉波沃燕尾服效应和他的反对派立场。Lili Romli说，它带来的后果是，如果有比伯拉波沃更好的佐科维反对派人物，大印尼运动党在万丹的选票能够下降。不可否认，伯拉波沃燕尾服效应抬高了大印尼运动党在万丹八个区域的获票。万丹地方议会议长，也是大印尼运动党地方理事会主席Andra Soni也支持这个说法。他认为，万丹选民对伯拉波沃的效忠度和兴趣很高。他说，其实2019年伯拉波沃并没有完全来万丹拉票。

反之，斗争民主党在万丹的优势也是佐科维总统候选人在2014年大选的燕尾服效应，导致在勒巴和丹格朗县市和南丹格朗市获胜。甚至斗争民主党2019年大选在丹格朗县获票52.2%，是改革时期获票最高的政党。

目前民主党能够在勒巴和丹格朗市维持优势，因为有Iti Octavia Jayabaya县长和Arief Wismansyah市长。而福利公正党还依靠南丹格朗市和班底兰，目前开始从之前建设团结党的票仓转变成福利公正党的基地。

在万丹东部的政治状况如何？大丹格朗(Tangerang Raya)是与万丹西部(西冷和芝勒贡)和万丹南部不同。在丹格朗，中间阶层比例相当大，对更独立的选民有影响，但是对日常政治持批判性态度，同时趋向观望与实用主义态度。

这个状况与万丹西部和南部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的状况，使很多地方精英利用社会资本巩固亲朋关系。控制地区的头头，与当权官僚，甚至宗教教长紧密结合，成功的掌握选民，形成有主宰性的亲朋权力。

这影响着政党的选择特点。在万丹西部和南部的任何地区，有维持地方首领，“好心”的权力王朝。这个紧密结合的关系，对公民社会力量造成强大的压力，使它不能发出有力的批判声音。

在这样的状况，一般社会没有能力与这些“王朝”竞争或反抗，因为资本力量的强大和官僚的网络。带有亲朋戚友，个人关系色彩，甚至实用主义，成为更能主宰，导致政党的宗教认同成为无力。在这样的局势下，民族主义政党能够取得比伊斯兰政党更大的优势。

椰風蕉雨

印尼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分量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中国于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亲临开幕式并发表演讲，重申中国通过BRF论坛推动共同发展和福祉的承诺。

到目前为止，有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已确认与会，意味着全世界近七成的国家都来了，体现了对“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口碑和成绩的“投票”，更是对共建“一带一路”未来的期待，说明大家为了共同的发展与和平而走到一起，证明了“一带一路”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顺应了国际社会主流的愿望和需求。

印尼国际关系专家赖剑文博士(Harryanto Aryodiguno)撰文《印尼的机遇与挑战：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看印尼与中国经济合作十年》称：“中国的经济对外发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越来越侧重于印尼，这个国家经常被赞誉为‘崛起之国’和‘充满希望之国’。这观念的转变是由对印尼持续经济增长的预期推动的。有些因素支持了这一积极前景，使印度尼西亚成为全球经济动态的重要参与者。”

他认为，随着印尼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活动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印尼增强在中国等合作伙伴心中的分量，把印尼视为经贸投资的战略伙伴。两国间的共商共享不仅强化了中国在印尼的根基，还以经济互惠和国际合作为宗旨，铺平了发展的道路。

印尼为中国的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自然资源，而中国则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种相互依存加强了彼之间的政治互动，双方都愿意确保贸易互惠的持续性。印尼政府须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包括密切关注可能影响双边关系的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并积极参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论坛，以确保国家及区域性的利益得到维护。

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佐科维总统协同夫人及一批官员，于10月16日下午4时10分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主要是参加于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时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主持印中双边会议。

本月初，当雅万高铁(KCJB)或“风驰”(Whoosh)正式开通运营后，引发了国内外媒体及民众的关注，给予印中合作的这项“一带一路”工程很高的评价。国企部长埃里克(Erick Thohir)于14日表示，佐科维总统近日访问中国时，会讨论继续开通前往泗水的高速列车项目，研究让印尼火车制造公司(INKA)参与制造的技术性问题。

除了讨论高铁项目外，佐科维还将讨论加速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经贸方面的合作。埃里克说，INKA需要获得技术转移，需要学习掌控技术。还希望改善合作结构、利息和所有权方面的问题。但却没有进一步透露这些技术转让将与哪个国家进行合作。

《时代网》(TEMPO.CO)于17日报道，佐科维总统于周二将进行一系列国事活动，早上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双边会议，随后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致意，再赶赴世界酒店与斯里兰卡总统拉尼尔(Ranil Wickremesinghe)会谈。然后，佐科维将被国礼接待在人民大会堂议事厅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议。

佐科维16日出国前，在珍卡连苏哈国际机场向记者表明：“我们将与中国商议一些重要事务，其中包括如何提升印尼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吸引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以及双方加大在保证粮食储备方面的合作。”印尼对中国贸易出现顺差，这是可喜的。

电视台转播，在21响礼炮及礼宾仪仗队的迎接下，佐科维踏着红地毯走进人民大会堂，与习主席一起站在检阅台上，军乐队奏响了印中两国国歌。印尼CNBC网于17日报道，总统率几位部长和官员，与中方举行了双边会议，并签署一些合作文件。晚上，总统伉俪将与亲临“一带一路”峰会的多国元首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晚宴。集体拍照时，总统伉俪与普京总统被安排在习主席夫妇的两旁，可见对印尼的重视。

当前巴以冲突又起、俄乌战火未停，在全球普遍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有“一带一路”峰会这样一个寻求国际合作、共商共建的论坛，并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参与，是值得珍惜的。论坛向世界发出清晰、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人心所向，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依然是国际社会间的强烈共识。

评论分析，参加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很多是穆斯林国家，他们对于加沙地区巴勒斯坦平民的惨况无比沉痛，但也明白在联合国的会场被西方所掌控。难得能有于北京聚会的良机，印尼作为最大穆斯林国家，佐科维的表态倍受期待。

印尼与“一带一路”有着不解之缘。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正是在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历史上，南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中国古代瓷器。15世纪初，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到访印尼，至今还留有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的遗迹。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线到面，表明了其内在生命力和韧性，已形成不可逆转的势头。祝愿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祝福印尼在“一带一路”取得更高的成就。

吉布兰，欢迎加入俱乐部！

■ 作者：DR.Jannus TH Siahan

原文刊载于2023年10月17日《罗盘报》官网

作者简介：万隆巴渣渣兰大学社会学博士、社会和公共政策观察员；印度尼西亚可持续采矿倡议（IISM）研究员；曾担任记者，并在采矿业工作。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A·温特斯(Jeffrey A. Winters)在其《寡头政治》一书中写道，印度尼西亚在苏哈多下台后经历了“双重转型”。第一个过渡是公众普遍知晓的过渡，即从独裁政治制度到更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及另一方面的经济自由化。

到目前为止，只有这种转变在公共领域得到了熟悉的回应。这种转变得到了学生和活动家的回应，由观察者在电视摄像机前传达，被政治吹嘘，由学者和官僚讲课。虽然，其他转变很少被提及，但是，杰弗里·A·温特斯在其著书中提出了这种转变理论，即从一种寡头模式到另一种寡头模式的过渡。

苏哈多在那个时代成功驯服的“苏丹寡头”转向了不再受新秩序后组建的新政府控制的“统治寡头”。因此，温特斯说，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并没有从苏哈多式的威权主义过渡到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所理解的民主，而是从威权主义过渡到“犯罪民主”，寡头在政治体系中传播和游击，在政党内部购买影响力，甚至直接参与政党的组建和运作。

起初，这种犯罪民主模式是秘密进行的，落后于选举民主进程。寡头们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民主化进程，试图用一只手让权力远离腐败的机会，然后，慢慢地把它拿起来，转移到商业集团，这将增加寡头对权力的压力。

在苏西洛总统时代，寡头在政治体系中游荡，使得当时的国家领导层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善变的领导层，决策中的旧领导层，因为，它必须考虑寡头的各种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干预总统选举的状态。

随着印尼进入佐科维时代，寡头们越来越自由。他们不仅在政治领域掌权，而且进入政府体系，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据战略部长职位，或直接在同一会议室对新统治者施加压力和影响，新统治者被打磨得好像很民粹主义和受欢迎，但实际上每一个决定都严重依赖寡头。在政府这样的政治经济构成下，佐科维被困在寡头牢笼中，佐科维本人可能没有预料到。因此，在寡头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很难像新秩序时代以来飙升的东亚地区国家那样实现高效率。

政府将继续被指示增加债务，远远超过前几届政府的成就，将其作为投入国民经济体系，但未能产生相应的投入。

只有精英与权力相结合的网络才能享受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有继续停滞的潜力，就像过去九年一样，劳动力吸收停滞不前(幸好有网电摩托车出租车和电商)，扶贫不力，不平等现象没有改变。

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因为，国民经济陷入了经济寡头政治，这种寡头政治将佐科维总统想要做的提高效率的所有努力都被作为人质。

政府将躲在宏观指标后面。只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绿色，事情就井井有条。寡头是主要的鉴赏家还是普罗大众并不重要。

无论舶来品是否由寻求进口配额的寡头进口，只要通货膨胀处于货币控制之下，那么，业务就被认为是完成了，平安无事了。这是未来的经济阴影。

在政治上，民主已经成为寡头控制总统府的强大舞台，包括将标准的宪法规则调整为往往只有利于一两个政党的规则。例如，在总统和副总统提名领域，在政党方面，至少需要议会20%的选票。民主活动人士在宪法法院大喊大叫，起诉结构性歧视。但是，他们的声音被认为是破碎的收音机，仅此而已。但是，当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年龄问题在宪法法院审理时，结果，实际上让许多政党感到惊讶。虽然未满40岁，但是，已经或正在担任民选官员，例如地方领导人，就可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公众对宪法法院的关注一直是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因为，刚好与普拉波沃与佐科维总统的长子吉布兰进行组合的构思联系起来。

因此，宪法法院最终作出裁决，在年龄问题上似乎符合公众的愿望，但是，通过后门将权力网络和寡头的利益包括在内，利用另一个迄今为止很少被公众讨论的问题，即“担任过地方领导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宪法法院似乎关闭了吉布兰竞选副总统候选人的前门，然而，另一方面甚至没有让吉布兰被关在房子里，保持让后门打开。当然，感觉“棘手”和“烦人”。

因此，今天，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的民主制度一个接一个地被少数精英“操纵”，以消除迄今为止已被证明尚未被普罗大众感受到的各种政治经济野心。

这应该是这个国家民主斗士的危险信号。究其原因，候选人不再专注于在选民面前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推行各种有利于人民的计划，而是敢于篡改宪法和民主制度，一方面确保获胜，另一方面继续执政。自两年前以来，这些危险信号实际上已经出现。延长总统任期和三届任期的构思是一个早期信号，表明民主制度和我们的宪法似乎正在被“挑动”甚至“操纵”。因此，今天的宪法法院的裁决可能是对少数权力网络和寡头未能实现的三任期构思的替代品。

当然，并非没有先例。菲律宾前总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推举其女儿担任副总统。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未渴望过三届任期。

今天的宪法法院裁决，最终也确保了吉布兰可以进入由几个政治和经济权力网络组成的俱乐部或称寡头政治，他们希望确保选举结果不会损害那些对当今权力相当满意的人的利益。

必须承认，今天宪法法院裁决的旅程相当曲折。当然，已经花了很多钱，无论是故意“推动”公众对普拉波沃-吉布兰组合的想法的道具，还是到各处进行游说。投入的精力当然不小。

虽然，今天取得的结果实际上并不能保证胜利，但是，如果确实如此，普拉波沃-吉布兰将联袂参选，因为，毕竟最终结果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宪法法院手中。但是，从近年来的经验来看，这个权力和寡头网络的行动总是设法获得令人满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寡头网络与东亚国家的寡头网络一般不同。印尼的寡头区别于与韩国财阀、日本系列会社或中国的国有企业商业集团，这使得印尼远远落后，在这些国家，政府比寡头强大，因此，政府有权决定政治和经济方向。

然而，在印度尼西亚，寡头比政府和民选统治者更强大，特别是如果新统治者的选举正是由于寡头资本的干预，那么，与这三个国家相比，情况发生了逆转。在这里，决定国家政治和经济走向的不是政府，而是将其利益转化为国家利益的寡头网络。

因此，如果甘贾尔与阿尼斯阵营不进行强大的“抵抗”，特别是基于民众选票的抵抗，那么，这个权力和寡头网络很可能会在2024年的选举中再次取得最大成果。

但是，除此之外，作为对今天宪法法院裁决的回应，我要祝贺吉布兰获得了这个巨大的新机会。吉布兰，欢迎加入俱乐部！

此外，作为一个谦卑的公民，我也想与吉布兰和作为父亲的总统先生分享一句精辟的名句，我引用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声明中的一条简单的话语。约翰·亚当斯指出，当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政治权力就会流向那些拥有者，远离公民，最终导致寡头政治或暴政。

希望，总统先生与公子能够理解其含义。 译者：亮剑